

中国宗教学40年

(1978—2018)

卓新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宗教学40年

(1978—2018)

卓新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宗教学 40 年: 1978—2018 / 卓新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203 - 3949 - 0

I. ①中… II. ①卓… III. ①宗教学—研究—中国—1978—2018 IV. ①B92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680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5.25
插页 2
字数 560 千字
定价 1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撰稿人：

宗教学理论研究	金泽	赵广明	梁恒豪
	李华伟	李金花	冯梓琏
当代宗教研究	黄奎	向宁	
佛教研究	华方田	纪华传	
道教研究	王卡	李志鸿	
儒教研究	梁溪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李志鸿		
基督教研究	卓新平	唐晓峰	
伊斯兰教研究	周燮藩	李林	
其他宗教研究	卓新平		

序 言

卓新平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纪念，对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而言，是回顾、总结中国当代宗教学发展走过的 40 年历程。中国宗教学的形成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宗教学真正系统化、专业化全面发展，则是 1978 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与成果。40 年前，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处于“早春二月”的状况，成建制、有规模的宗教研究机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家，乃是当时“一枝独秀”的奇特景观。40 年来，中国宗教学蓬勃发展，姹紫嫣红，蔚为大观。在今天中国宗教研究硕果累累、百花争妍的美景中，世界宗教研究所正享受着一种“在丛中笑”的陶醉。

20 世纪初，当宗教学刚传入中国时，学术界最为关注而且讨论激烈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宗教”。当我们步入 21 世纪时，我们的问题意识已升华到如何为“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定位、怎样在理解“宗教”的基础上来为依法管理而制定法规。宗教学的概念和体系构建，其关键也在于对“宗教”的界说与诠释。应该说，中国当代宗教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宗教”定义的反思和拓展。两个世纪的关联，加之漫长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悠远的华夏精神诉求，使人们在客观、科学地看待“中国有无宗教”问题时，必须首先弄清在此言述、讨论的“宗教”究竟是什么。曾有人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宗教”这一术语或构词，由此亦不承认“宗教”所要描述、说明之事物的根本存在。其实，在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及其语言文字表述上，“宗教”所蕴含的意义及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古代中国曾用“宗”和“教”二字来分别以不同侧重来表达这一核心观念。其中“宗”以其“尊祖庙”之意而曲折地表现出“宗教”制度层面的意义，即以具有

外在、客体性的相关场所、建构、仪礼来尊崇和敬拜神明、纪念祖先。这在古代“禋于六宗”的活动中得到具体而集中的体现。而“教”则以其“教化”之意来突出其精神信仰、灵性追求层面的意义，强调内在、主体的精神修养，以把握“修道之谓教”的真谛。在此，上施下效、从学入道的“教化”得以提高和升华，从而有了“神道设教”之“宗教”，呈明其“对神道的信仰”之真义。此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的道理。在专门术语上表达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关联及共构，则是“宗教”二字合用的水到渠成。不过，“宗教”二字最先合用乃见于佛教文献，而“宗教”作为佛教术语则出现了一些嬗变或异化。例如，早在5、6世纪梁朝的佛教学者就已将“宗教”二字合用，且多有阐发。一般而论，当时佛教所理解的“宗教”虽在抽象意义上已接触或体悟到“人生宗旨，社会教化”的蕴涵，但其具体所指乃是“崇拜佛陀及其子弟的教诲”，其中“教”为佛陀之言，“宗”即其弟子之传，从而达到信仰上的打通和共构。此后，在中日佛教交流过程中，“宗教”这一表述因佛教典籍的翻译而被日本佛教界所应用，但其理解上已有区别，即把语言难以表达的真理视为“宗”，而关于这一真理的教义则为“教”。于是，“宗教”成为日本学术界常用的术语。当日本与西方在近代历史上形成交流关系时，日本学界开始用“宗教”来翻译、表达西方文献中频频出现的“religion”一词。自1868年以来日本明治政府的文件，多将西文“religion”译为“宗教”，指西方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各派。这样，“宗教”一词开始在日本获得“宗教学”意义上的内涵。据传中国学者黄遵宪在其1887年定稿、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多用“宗教”来对照或对应西文religion，故有“宗教”的现代含义“假道日本而入中国”之说。不过，“宗教”的这一应用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或达成共识，对译religion的中文术语还包括“教”“巫”“讖纬之学”，甚至音译“尔厘利景”等。所以“宗教”术语上的歧义和认知上的混乱已延续至今，相关争论亦往往是一触即发。但应该承认，当代中国宗教学关于“宗教”术语的讨论已不再是泛泛而论，而更多体现出其学理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反映了中国学者客观、认真和理性的追求。

20世纪中国学术界争论的另一大问题则为“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亦涉及中国传统主体文化的“宗教性”问题。自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提出“儒教不是宗教”之说，这一争论已经历了三个回合，而在第三个回合即1978年以来的讨论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儒教是教”与“儒教非

教”之争中，其分歧触及多个层面，但其关键点仍是对“宗教”的基本理解。例如“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区别或关联，“人文性”与“宗教性”的异或同，“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分离或呼应，“神道设教”与“文以载道”的流变或相合，都不能回避对人的“精神性”“宗教性”的解答和诠释。同样，对于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独尊儒术、宗主正本的产物，还是“礼失求诸野”的结果，不仅关涉儒教在主流政治文化或民间通俗文化中的地位，而且也必须说明这两种文化究竟有无“宗教性”。在此，从宗教学的角度则产生了“宗教性”与“宗教”的关联，以及“宗教性”在界定“宗教”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自汉朝司马迁撰写《史记》，从“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到论及“鲁人皆以儒教”（《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之说，关于“儒教”的“宗教”意义和地位问题开始浮现。“南北朝以来，儒教与佛、道二教并称为三教。”由此形成“三教譬如鼎足，缺一不可”的局面，而“三教”这一表述长期以来未被质疑。但元朝《道书援神契》提出“儒不可谓之教，天下常道也”，从而为儒教“非教”说埋下了重要伏笔。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制度性的“儒教”基本摧毁，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对精神性的“儒教”加以清算，“儒教”以往的“正统”“指导”地位不复存在，传统中国文化同样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在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和谐”文化的构建中，我们已感觉到对儒家文化的挖掘和应用。但在当前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中，缺失“儒教”的佛、道二教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很难独当扶持、复兴、弘扬本土宗教文化的大任。这一历史与现状，都促使我们再次深思“宗教”的意义问题和审视中国文化发展中“宗教”的作用问题。

“宗教”内在意义的厘清及其构成因素的涵括，亦为中国宗教学的研究范围、指导思想和应用方法提供了参考。在当代中国的“宗教”之探中，很显然是经历了从宽泛性、功能性、应用性的“宗教研究”向学科性、体系性、方法性的“宗教学”之转移和升华。当然，宽泛或应急的宗教研究今天仍很普遍，而正是在这一形势中，一支潜心研究“宗教学”专业的学术队伍也已悄然诞生。中国宗教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侧重于宗教史学和宗教哲学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对宗教史料的发掘和对宗教现象的理论说明、哲学分析。由此，中国宗教学乃以跨学科、多学科的态势而进入中国学术领域。这样，中国当今学术界的宗教研究范围较广，研究人员众多，学术成果亦体现出宗教研究科际整合的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宗教学的40

年历程所覆盖的研究领域包括宗教学理论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佛教研究、道教研究、儒教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和其他宗教研究（主要为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教、锡克教等的研究和巴哈伊教等新兴宗教的研究）。这基本上为一种广义的宗教学研究，而狭义的、界定在传统“宗教学”范围内的宗教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本身，其涉及的内容既有在中国比较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也有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方面的探讨。显然，这些研究及其学科分支与西方宗教学的传统框架和研究视域并不完全相同，突出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正是中国宗教从零散的学者个人研究走向宗教学科体系化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宗教学真正得以创立和发展成为一门影响广远的人文社会科学，乃是这 40 年的开拓和创新。40 年来，中国宗教学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研究从随意性、自我个性到规范化、学科化，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了总结中国宗教学 40 年的发展，梳理其学术成果和资料，我们在 2008 年编写的《中国宗教学 30 年》一书基础上补充完善，形成了当下这部著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来承担。全书共分为九章，其中，上述原稿第一章“宗教学理论研究”由金泽撰写，第二章“当代宗教研究”由黄奎撰写，第三章“佛教研究”由华方田撰写，第四章“道教研究”由王卡撰写，王卡先生已不幸去世，我们深表哀悼，第五章“儒教研究”由梁溪撰写，第六章“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由李志鸿撰写，第七章“基督教研究”由卓新平撰写，第八章“伊斯兰教研究”由周燮藩、李林撰写，第九章“其他宗教研究”由卓新平撰写；全书的编辑、统稿由卓新平负责。但因考虑到有关学者的学术个性和研究风格，在文字、体例上不做大的调整，所以各章的撰写、表述可能不完全一致，格式上没有统一规定，尚请谅解。这次出版补充了 2008 至 2018 年宗教学发展的内容，其中第一章由赵广明、梁恒豪、李华伟、李金花、冯梓琏补充，形成第九节“2008—2018 年宗教理论发展概况”，包括“宗教通史”（冯梓琏）、“宗教哲学”（赵广明）、“宗教心理学”（梁恒豪）、“宗教社会学”（李华伟）、“宗教人类学”（李金花）等内容；第二章第四节由向宁补充；第三章由纪华传补充；第四章由李志鸿补充；第五章由梁溪补充；第六章由李志鸿补充；第七章由唐晓峰补充；第八

章由李林补充。这部著作涉及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学者自 1978 年以来的研究为主，可能只少量论及在大陆出版的港澳台学者的著述，因此当代港澳台宗教研究这一领域应作为另一大的课题留待今后系统探讨。在本书所触及的研究领域，一般突出宏观描述和重点问题探寻，对相关议题的评价也主要反映出撰写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鉴于相关学术论文浩如烟海、难以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一一引证，故而只能以列举相关研究专著和翻译著作作为主，仅在某些具体讨论中提及或引用到一些论文。书中的展示和叙述乃是以一种学术素描的方式来简要回顾、总结中国大陆学术界宗教学研究走过的 40 年历程。因此，在研究内容上可能有疏漏之处，在学术评价上可能有不妥之见，还望学术界各位专家批评、指正。中国宗教学发展方兴未艾，我们将继续努力。全书的策划、立意、编辑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这里，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黄燕生、冯春风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8 年 11 月 28 日补写

目 录

序 言	卓新平(1)
第一章 宗教学理论研究	(1)
第一节 工具书和宗教通史研究	(3)
第二节 概论性著作	(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无神论研究	(6)
第四节 宗教文化学	(7)
第五节 宗教哲学	(10)
第六节 宗教社会学	(12)
第七节 宗教心理学	(14)
第八节 宗教人类学	(15)
第九节 2008—2018 年宗教学理论发展概况	(35)
第二章 当代宗教研究	(5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5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问题研究	(64)
第三节 当代宗教研究的中国视域与国际视野	(76)
第四节 当代宗教研究(2009—2018)	(104)
结 语	(130)
第三章 佛教研究	(135)
第一节 20 世纪我国佛教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	(135)

第二节	佛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143)
第三节	我国佛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192)
第四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概况	(197)
第四章	道教研究	(203)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前的道教研究	(204)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道教研究概况	(206)
第三节	新时期道教研究的重要成果	(208)
第四节	2009—2018年的道教研究综述	(219)
第五章	儒教研究	(235)
第一节	80年代前后“儒教是教”说提出及其引起的争论	(236)
第二节	自80年代末至2000年儒教研究的深入展开	(248)
第三节	2000年至今的儒教问题研究	(273)
第四节	2009年以来的儒教研究	(286)
第六章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298)
第一节	1978年以前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概况	(298)
第二节	1978年以后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概况	(299)
第三节	“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间宗教、民间秘密 宗教、教门、民间教派	(307)
第四节	宝卷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314)
第五节	民间宗教的系统:白莲教及白莲教之外的多种 民间宗教教派	(319)
第六节	民间宗教与社会运动	(322)
第七节	民间宗教的传承与转化	(330)
第八节	法与派:民间宗教法术仪式的可能性研究	(332)
第九节	民间宗教研究的方法:注重文献与田野的结合	(336)
第十节	2009—2018年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综述	(339)
第七章	基督教研究	(352)
第一节	世界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研究	(354)

第二节	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	(365)
第三节	圣经研究	(386)
第四节	中国基督教研究	(390)
第五节	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	(420)
第六节	2008—2018 年中国基督宗教研究	(430)
第八章	伊斯兰教研究	(453)
第一节	回顾与展望:百年伊斯兰教研究史	(454)
第二节	学术研讨会	(464)
第三节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471)
第四节	世界伊斯兰教研究	(483)
第五节	工具书、资料整理和学术刊物	(490)
第六节	当代伊斯兰教研究	(494)
第七节	近期重大问题的研究	(499)
第八节	学科建设	(512)
第九节	2009—2018 年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综述	(517)
第九章	其他宗教研究	(530)
第一节	犹太教研究	(530)
第二节	印度宗教研究	(536)
第三节	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研究	(538)
第四节	新兴宗教研究	(541)
第五节	神话、古代宗教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544)

第一章

宗教学理论研究^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学术建设，可以说是走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道路，至今已经累积相当的成果，亦凝聚一批学术人才。卓新平曾在回顾20世纪中国宗教的学术研究发展历程时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者曾在20世纪初围绕着“中国有无宗教”和“宗教是什么”展开了深入讨论和激烈争论，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学者又围绕着宗教、信仰、迷信之关系而进行了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亦进入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发展阶段。学者们遵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理论上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禁区，从而使中国宗教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阶段的学术讨论非常活跃，先是围绕宗教究竟是否为“鸦片”展开了研讨，随之探究了宗教的社会功能、集体“无意识”或心理底蕴问题，最后又深入到宗教的“文化”研究和理解、宗教与精神文明建设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问题。与前两个时期宗教研究的明显不同，最近40年来的中国宗教学研究突出从“文化”的综合意义上来分析宗教、研究宗教、评价宗教。在这种分析研究中，中国学术传统方法仍在发挥作用，但学者们更加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即注意吸纳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及时采用令人耳目一新、体现创新精神的现代研究方法。^②

^① 本文写作参考了卓新平《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卓新平《20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宗教学理论研究》，何光沪《宗教学研究》等文章，见《20世纪中国大典·宗教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卓新平：《20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见《20世纪中国大典·宗教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宗教活动的逐步恢复,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繁荣,为宗教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氛围,反过来也为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挑战,这就使中国学者在建构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现代意义之宗教学乃来自西方,因而注重翻译、介绍西方宗教学著作,以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另一方面则奋起直追,推出体现中国特色、展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学术论著。卓新平对这一时期宗教学研究的主要脉络作出如下概括:学者们曾围绕“宗教与鸦片”“宗教的定义”“儒教是否为宗教”“宗教文化”之理解和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问题展开争论。针对“宗教是否为鸦片”,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曾展开了一场所谓“南北论争”,深化了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论断的理解。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包括赵复三的《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1986)、江平的《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论和党的宗教政策》(1986)、吕大吉的《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思考》(1987)、俞朝卿的《再论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1987)等。在“宗教”定义上,吕大吉提出了宗教的观念、体验、行为、组织与制度四要素说,并在《宗教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将“宗教”定义为“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一定义亦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针对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儒教非教说”,任继愈于70年代末率先提出“儒教是教说”。此后,李申等人支持此说,并系统开展了中国儒教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则持不同意见,或提出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其他说法。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牟钟鉴关于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之说,他认为中国宗教与西方相比有“宗法性强烈、皇权支配教权、多样性与包容性、注重宗教社会道德功能的人本主义精神”这四个特点。对“宗教是文化”之理解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思潮,并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宗教文化学。而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讨论中,戴康生、彭耀等人分析了宗教的正、负功能,提出了在政治、物质和精神文明、文化学术以及对外交往五个方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和协调,冯今源则对

宗教道德在这种适应和协调中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①

由于有些理论方面的学术建树和论争在当代宗教研究中多有论述，我们在此主要是围绕宗教学理论的相关领域和分支学科，对4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是专著和译著^②）做一粗略描述和介绍。

第一节 工具书和宗教通史研究

工具书是学科建设的基本环节，通过工具书的编纂，不仅厘清学科的境界与基本概念，而且在编写过程中，培养一大批青年学子走上宗教学研究之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1981），世界宗教研究所编的《各国宗教概况》（1984），罗竹风等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1988），孙洪涛等主编的《宗教工作手册》（1989），王作安主编的《宗教工作基础知识》（1990），雷镇闾等主编的《宗教知识宝典》（1991），罗竹风主编的《宗教经籍选编》（1992），初秀峰、佟杰主编的《世界宗教人物词典》（1992），宗教研究中心编的《世界宗教总览》（1993），邢东田的《当今世界宗教热》（1995），黄夏年主编的《世界宗教名胜》（1994），朱越利主编的《今日中国宗教》（1994），李桂玲编的《台港澳宗教概况》（1996），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1998），曹中建主编的《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1998；1997—1998，2000；1999—2000，2001；2001—2002，2003；2003—2004，2006；2005—2006，2008），赤耐、段启明等编写的《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下卷，1999），张杰著《冥冥天国苦追求：辽河流域宗教文化》（2000），斯马特著《世界宗教》（2004）等。

宗教史学（特定宗教的历史研究参见各教）方面的重要著述包括黄心川等《世界三大宗教》（1979），张文建的《宗教史话》（1981），张绥的《宗

^① 卓新平：《宗教学理论研究》，见《20世纪中国大典·宗教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为了避免与其他学科（如佛教研究、基督教研究）重叠，我们主要收集了归入中国图书分类法中属于B91、B92、B93、B98和B99及其子项中的相关成果。但是这种分类有一定的局限，诸如卢国龙的《道教哲学》（1997）和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2002）等，都没有归入宗教哲学门下，而现归入宗教哲学门类下的许多成果，却应归入基督教研究；还有许多成果则归入历史、文学或文化等门类。这种分类上的不统一，不仅造成查找的困难，而且势必挂一漏万。在此向相关学者致歉，也敬请读者参见相关门类以有所弥补。

教古今谈》(1985),陈麟书等的《世界七大宗教》(1986),陈荣富的《宗教的历程》(1986),于可主编的《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源流》(1988),黄心川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1988),知识出版社编写的《真实与虚幻之间:宗教史事和神话传说》(1989),罗竹风主编的《宗教通史简编》(1990),曹琦和彭耀编的《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1991),王友三主编的《中国宗教史》(1991),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1992),阮仁泽、高振农主编的《上海宗教史》(1992),吴立民等《中国宗教六讲》(1993),姜立勋等《北京的宗教》(1995),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新编中国宗教史》(1995),高令印等编的《厦门宗教》(1999),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1999),杨学政主编的《云南宗教史》(1999),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教通史》(1999),饶宗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2000),罗广武的《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2001),林宗泽主编的《宗教史概论》(2002),张化的《上海宗教通览》(2004),詹石窗、盖建民主编的《中国宗教通论》(2006)等。

译著则有善慧法日的《宗教流派镜史》(1980),克雷维列夫的《宗教史》(1984),托卡列夫的《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1985),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史实》(1986),夏普的《比较宗教学史》(1988),缪勒的《宗教的起源与发展》(1989),卡莫迪的《妇女与世界宗教》(1989),贾吉的《世界十大宗教》(1991),加里·特朗普的《宗教起源探索》(1995),德列斯维声斯卡娅的《中亚宗教概述》(2002),大卫·休谟的《宗教的自然史》(2003),玛丽·帕特·弗舍尔的《亲历宗教·东方卷》和《亲历宗教·西方卷》(2005)等。

第二节 概论性著作

尽管中国的宗教国情不同于西方,但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却随着思想解放与对外开放的步伐而高涨。在基本上属于开创阶段的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如何在整体上把握宗教并给予相关的社会各界一些基本概念,乃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1982年,国家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体系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这项任务交由吕大吉主持,集体完成。1985年,《宗教学通论》形成初稿,先打印成内部讨论稿,反复讨论修改后,1986年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正式出版。该书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1990), 第一届全国图书奖(1980—1992)提名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1992)。牟钟鉴认为此书有四大特点: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以真理为师”, 坚持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同时博采众长, 力求使宗教学研究走向科学化和普遍化。二是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作者提出“需理性, 信仰要宽容”的原则, 既不赞成用信仰主义的态度研究宗教, 也不赞成与宗教对立而无同情的研究立场。提倡理性与宽容并重, 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 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宗教, 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三是在理论结构上建立了更为严谨的逻辑框架, 这个结构是多层面的、立体化的和多姿多彩的。四是在理论特色上凸显了“宗教四要素说”, 把四要素作为统一说明一切宗教现象的基础性原理。四要素说一经提出便在学界迅速传播流行, 得到许多学者和读者的认同。^①

吕大吉承担的国家项目正式立项, 掀起了中国宗教学理论建树的新篇章, 一大批学者积极行动起来, 努力的成果则是一大批概论性著述先后问世, 如唐尧的《宗教概述》(1983), 雷镇闻主编的《宗教概论》(1984), 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1986),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的《宗教论稿》(1986), 赖永海的《宗教学概论》(1989), 吕鸿儒、辛世俊的《宗教的奥秘》(1989), 卓新平的《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1990), 卢红等的《宗教: 精神还乡的信仰系统》(1990), 赵锡琪主编的《宗教学》(1990), 罗竹风主编的《宗教学概论》(1991), 卓新平的《世界宗教与宗教学》(1992), 吴倬编的《神的世界探源: 宗教学篇》(1994), 罗竹风主编的《人·社会·宗教》(1995), 吕大吉的《宗教学通论新编》(1998), 陈荣富的《比较宗教学》(1993), 吕大吉的《西方宗教学说史》(1994), 时光、王岚编写的《宗教学引论》(1994), 张志刚的《走向神圣: 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1995), 陈麟书主编的《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1996), 龚学增主编的《宗教问题概论》(1998), 莎迅等的《宗教王国的奥秘》(1998), 卓新平的《宗教理解》(1999), 杨慧林的《追问“上帝”: 信仰与理性的辩难》(1999),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编的《世纪之交的宗教与宗教学研究》(2000), 高长江的《宗教的阐释》(2002), 孙亦平主编的《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2002), 张志刚的《宗教学是什么》(2002), 刘建、罗伟虹主编的《宗教问题探索: 2001年文集》

^① 牟钟鉴:《宗教学通论新编·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1—4页。